

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

——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结合视角

陈宗仕 郑路

提要:本文结合了组织社会学两大流派——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的视角,探索我国不同省区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区企业影响是负面的,却有利于发展程度低的省区的民营企业;前者是组织环境中的竞争性机制所致,后者主要是受合法性机制的影响。研究进一步发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小型民营企业和年轻的民营企业更为有利。本文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对种群生态学都有所突破,另外本文的发现也弥补了“新进入缺陷”理论的不足。

关键词:种群生态学 制度学派 合法性机制 竞争机制 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企业绩效

组织社会学一个核心的假设是组织的环境是模糊多变的,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Fligstein & Dauter, 2007;周雪光,2003)。种群生态学侧重技术环境对组织形式、生存的影响(Hannan & Freeman,1977;Haveman & Rao, 1997),而制度学派重在考察社会规范、认知、合法性等制度性因素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Meyer & Scott, 1983;DiMaggio & Powell, 1983;高柏,2008;郭毅等,2007)。这些研究要么探索较长历史阶段的某个组织形式变迁规律,要么是揭示在某种制度约束下的组织如何做结构和行为的选择,而鲜有研究揭示制度变迁速度与企业表现的关系。研究转型经济的组织学者也多是从事组织为克服制度障碍如何寻求其他途径的视角或不同制度下的企业表现来探索制度与企业表现的关系(Peng, 2000;Nee, 1992;Li et al., 2008)。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尝试分析制度变迁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制度环境有稳

* 本文初稿曾在“第十一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2014 杭州)”上宣读,感谢赵鼎新、曹洋等参会师友给予的富有帮助的点评和建议。本文的写作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的资助(12YJC840064)。

定的,有转型的,有变化快的,变化慢的(Roland, 2004)。不同的变迁速度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绩效;同时,在产业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下,组织环境和制度的变迁速度还会因产业部门和地域而不同。现有文献显示,不同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影响有别,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企业效益(Li et al., 2008),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基于静态制度进行的比较分析,忽略了动态的制度变化对于企业发展和绩效的影响。例如,一个市场化较高而稳定的制度环境比一个市场化较低但是越来越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绩效的贡献反而可能会更低。对此类现象的研究,是以往从静态制度的优劣来比较分析企业效益的研究所忽略和无法实现的。周雪光、赵伟(2009)指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明确运用组织理论和模型、与组织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内容进行对话方面还很有欠缺。本文将结合组织社会学的两大流派即种群生态学与制度学派的视角,考察中国各省区的民营经济不同发展变迁速度对民营企业绩效的不同影响。

一、种群生态学理论

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认为,新的组织形式在起初阶段因为数目少,合法性弱,会导致组织的死亡率高,存活率低;随着组织的增多,组织形式的合法性会增强,这将促进企业生存,降低企业的死亡;但当组织数目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组织的合法性机制将被竞争机制所取代,也就是组织不再担心合法性危机,相反,由于组织数目过多,在资源、市场等方面开始出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组织的死亡率又开始上升,存活率开始下降(Hannan & Freeman, 1977)。汉南和弗里曼发现美国工会在 1836 - 1985 年期间的组建率呈倒 U 型(Hannan & Freeman, 1987),而同一期间工会的解散率呈 U 型(Hannan & Freeman, 1988)。卡罗尔和德拉克诺克斯指出,阿根廷(1800 - 1900 年)和爱尔兰(1800 - 1970 年)的报业均出现 U 型的死亡率和倒 U 型生存率(Carroll & Delacroix, 1982)。种群生态学作为组织社会学的重要学派,贡献了大量富有洞见的研究,然而该学派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种群生态学学者大多通过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组织的存活率、死亡率和组建率(Carroll & Delacroix, 1982; Freeman et al., 1983; Hannan, 2005;

Hannan & Freeman, 1987, 1988; Tucker et al., 1984), 而对组织的效益鲜有研究。惟一的例外是卡罗尔和霍对制度变量如何影响报业发行量的研究(Carroll & Huo, 1986)。卡罗尔和霍对制度的测量包括了经济的巅峰、低谷年份、商业失败的数目、工业产业数目、总统选举年份和政治动荡与否。他们发现只有政治动荡对报纸的组建和死亡有很强的影响, 而对报纸发行量影响比较弱, 其他制度变量都没有任何影响。

其次, 种群生态学多是研究某个组织形式在某一社会和制度环境里的长期发展规律, 而较少考虑同一社会和制度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区域性差异。汉南(Hannan, 2005)等学者认为组织的竞争环境是以国家为边界的, 而朱克(Zucker, 1989)指出组织可能在更小的区域内进行更激烈的各种资源竞争。虽然部分种群生态学者也意识到地方性的资源环境对组织有很复杂的影响(Carroll, 1985; Baum & Mezias, 1992), 合法性和竞争性机制可能会因地区有别(Carroll & Wade, 1991; Hannan & Carroll, 1992; Lomi, 1995)。比如, 鲍姆和梅兹亚斯(Baum & Mezias, 1992)发现纽约曼哈顿地区的酒店在规模、价格和地理位置方面存在的本地竞争越强, 越容易死亡; 罗密(Lomi, 1995)的研究将意大利分为13个区域, 发现在1964年至1988年间, 不同区域的农村合作银行在应对合法性和竞争性机制方面有差异。这种跨地区的比较研究在种群生态学中寥寥无几, 同时也局限于单一的行业。

用组织的个数来测量组织密度并对此进行事件史分析, 是种群生态学的一个显著特点(Hannan, 2005)。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 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辉煌发展以后难以实现突破。朱克(Zucker, 1989)指出, 种群生态学的组织密度仅仅测量种群内部的某种特征, 将种群的生存和竞争过于狭隘地限于某个组织形式内部(很多实证研究以行业为研究对象), 而忽视了种群间的竞争。我们认同朱克的观点, 认为以组织的个数来测量组织密度有其局限性, 缺乏与其他组织形式的比较。例如, 在一个经济总量很小、发展很慢的社会或地区, 某个组织数目的少量增加, 可能意味着合法性的显著提升; 而如果这种少量增加发生在一个经济总量很大、发展很快的社会或地区, 相比其他组织, 尤其是与之存在竞争的组织形式, 其合法性可能并不会提升。所以,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以某种组织类型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作为组织密度的测量指标, 其创新性和合理性表现在它更好地考虑了不同形式的组织间的竞争。

二、制度学派与种群生态学的结合

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学派与种群生态学派几乎是同时兴起的。制度学派侧重规范、标准、认知和文化环境,而种群生态学侧重组织的技术环境。两者互有批判和借鉴,也有学者结合两派的概念和机制进行研究(Baum & Powell, 1995; Carroll & Huo, 1986)。合法性的概念和理论在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中都得到了广泛讨论,既有相通也有不同之处。合法性在制度学派中被视为制度性因素,在制度学派中显得尤为重要(刘玉照、田青,2009;杨典,2011),多是静态研究不同合法性对不同组织的影响;而合法性在种群生态学中只是以组织密度彰显的技术因素,主要探索组织密度的高低对组织生存和死亡的影响。制度学派认为种群生态学的合法性概念只是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忽略了外部环境的支持,即社会政治合法性(socio-political legitimacy)(Baum & Powell, 1995; Singh et al., 1986; Suchman, 1995; Zimmerman & Zeitz, 2002)。朱克(Zucker, 1989)还指出种群生态学对合法性缺乏测量,简单地将组织的密度(组织的个数)等同于组织的合法性。鲍姆和鲍威尔(Baum & Powell, 1995)进一步批判种群生态学的组织个数(密度)与合法性的关系模糊,前者既像后者的替代指标,又更像描述后者的过程。此外,制度学派认为组织生存的具体历史环境对合法性的影响很重要,还批判种群生态学的合法性概念缺乏历史和具体社会背景(Zucker, 1989; Baum & Powell, 1995)。

另外,现有的制度变迁研究主要探索变迁的原因、机制以及变迁对组织结构、行为的影响。更宏观的制度变迁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比如很多研究发现,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比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要成功。在这些研究中,已有学者将制度变迁依速度分为快速变迁和慢速变迁(Roland, 2004)。然而,迄今为止,制度变迁研究几乎没有探讨制度变迁的不同速度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和绩效。

我们认为可以将种群生态学和制度学派结合起来,并运用种群生态学的概念和机制来探索制度变迁的速度如何影响组织绩效。首先,我们认为某时点的组织密度反映出某个组织形式的发展水平,比如该形式组织的销售市场规模、就业、投资所占比重等,彰显其认知合法性程度,这也是该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要素。另外,卡罗尔和霍认为制度

要素除了规则和信仰之外,还包括市场规模、形态、条件和稳定性(Carroll & Huo,1986)。所以组织密度是组织发展程度及其制度环境的良好测量指标。某时段组织密度的变迁速度则反映出合法性的过程,即制度环境的变迁速度。当组织密度或者说组织发展程度比较低时,影响组织效益的是合法性机制,组织密度的快速发展对组织效益有利;当组织密度或者说组织发展程度比较高时,合法性机制将被竞争性机制取代,组织密度的快速发展对组织效益不利。其次,种群生态学虽然认为组织的竞争环境以国别为界,但也承认同一社会或国家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是可能不同的。卡罗尔和霍认为市场规模、形态、条件等制度性因素会因地制宜,同时这种差异会影响到组织行为(Carroll & Huo,1986)。所以,某一形式组织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可能不一样,其合法性程度以及面临的竞争环境也不一样。在该组织密度比较低的地区,合法性机制占据主导,而组织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则是竞争性机制占主导。最后,考察组织的合法性等制度环境,还必须将组织密度和组织发展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因为组织合法性还包括来自社会、政治方面的支持。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考察我国不同省(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水平及速度对当地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还将探索制度快速变迁对具有不同组织特征(包括规模和年龄)的企业之绩效的影响。

三、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变迁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合法性。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民营经济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完全收归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营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给割掉。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地区的政策比较开放,一些个体民营经济得以兴起,即或如此,依然不能直接对外宣称为民营企业,而不得不挂靠在公有实体下取得合法地位。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立法于1987年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通过,称之为《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88年全国人大以此为基础颁布了国家层面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民营企业的合法性终于浮出水面。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确立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而在党的十六大上,民营企

业主被允许入党,此举被视为提高民营企业合法性的重大举措。但即或在民营企业合法性大为改善的今天,民营企业在行业进入、融资等诸多方面依然面临着歧视,而不得不依靠关系或谋求政治身份来争取这些资源(Li et al., 2008; Peng, 2000)。这些都足以反映合法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从民营企业发展历程来看,这既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也是区域阶梯型发展的过程,不同区域的民营企业兴起和发展速度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早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就获得了更大的政策自主权,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加大对内地的扶持,在 1999 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 年提出“振兴东北”,后来于 2005 年提出“中部崛起”。中西部地区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在税收、资金、用地等方面提供了比沿海更优惠的政策,以吸引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前往投资。与此相反的是,沿海地区经过快速发展之后,本土民营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且属于劳动密集型,占地多,提供的附加值低,所以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减弱;而当地政府在 GDP 增长率导向的驱使下,越来越注重扶持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本土的民营企业在资金、用地等方面越来越困难,这就是所谓的“腾笼换鸟”政策。这一政策在 2000 年后的沿海省份或多或少得到了采用(Zheng & Tong, 2010)。近 10 多年来,一大批民营企业从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转向相对落后的地区,例如东南沿海的服装业转向河南,温州的鞋业向重庆转移,而眼镜企业向江西转移等。

很多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文献运用 2002 年以前的数据,他们发现沿海的发展比内地要好很多(Fan & Sun, 2008),而最近的区域研究也发现中国政府努力提振内地经济,沿海内地差距从 2004 年起开始减小(Fan & Sun, 2008; Li & Xu, 2008; Chan & Wang, 2008; 许召元、李善同, 2006)。中国民营经济区域变迁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为测试我们以下的理论假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材料。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国转型经济中影响组织表现的因素和机制。

四、研究假设

(一) 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与民营企业绩效

种群生态学认为,某个组织形式在起初阶段因为数目(密度)少,

不太受市场认可,造成此类组织死亡率高,生存率低;随着该类组织数目的增加,合法性增强,死亡率下降,生存率上升,同时新建的组织也会越多;当组织数目(密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其发展不再受合法性支配,取而代之的是竞争性机制,该类组织因为数目过多导致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竞争加剧,抑制了新增组织数目,同时导致更多组织消亡。

如前文所述,受种群生态学启发,并结合制度学派的理论,我们认为当组织密度比较低时,由于合法性的因素,该形式组织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企业绩效;当组织密度比较高时,由于竞争性原因,该形式组织的快速发展不利于企业绩效。一些种群生态学研究显示不同地区的组织在应对合法性和竞争性机制方面不同(Baum & Mezias, 1992; Lomi, 1995)。因此,我们认为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较高的省区,民营企业合法性已经很强,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市场竞争机制的支配,因此民营经济增长只会加剧竞争,抑制这些地区民营企业的绩效;而民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区,合法性机制占主导地位,发展速度的加快意味着民营企业合法性的增强,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性还来自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有助于企业获得资源、拓展市场,从而提高绩效。根据上述原因,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省(区)的民营企业的绩效具有负面影响;相反,对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省(区)的民营企业的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二)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民营企业规模与绩效

现有文献认为大企业因为多元、规模经济以及程序正式化,从而使得运营、管理更有效,最终导致大企业有更好的绩效(Penrose, 1995)。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企业规模与市场权力有关(Shepherd, 1986),随着市场权力增加产生X-非效率(Leibenstein, 1976),也就是当大企业市场权力发展到垄断力量时,就会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从而降低生产和经营的效率。这些研究多是以稳定环境为背景而展开的。

种群生态学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大,组织的结构惰性(structural inertia)水平会增加,这种惰性会造成企业在适应环境变迁方面比较缓慢。一般而言,大企业由于规模大、程序正式、稳定和可靠性强,所以结构性惰性高(Hannan & Freeman, 1984);相反,小企业会较少受制于组织的惰性(Miller et al., 1982)。也有研究显示:

从企业产品创新的角度看,小企业在稳定环境中的收益比在易变环境中的收益要差(Covin & Slevin, 1989),当环境较动荡时,产品创新策略对小型的技术企业有更强的正面影响。我们认为在制度变化快的环境下,小企业由于组织惰性小,更容易灵活调整产品和市场战略,获得更好的业绩;大企业则由于结构性惰性,一方面不容易主动变革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另一方面局部的改良牵涉较多的种群和部门,调整和协调的成本更大,从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如小企业更明显。所以,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相对于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而言,更有利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取得更好绩效。

(三)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民营企业年龄与绩效

斯丁奇康(Stinchcombe, 1965)认为,新的组织缺乏经验,需要学习社会角色,协调员工的分工,同时加上低合法性的因素,在和现有的组织竞争的时候,会因为上述的“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很容易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死亡率较高;相反,老企业由于稳定性和可靠性而占有优势(Hannan & Freeman, 1984),因而死亡率较低。不少实证研究都揭示了企业年龄与企业死亡率呈负相关关系,比如弗里曼等学者(Freeman et al., 1983)的研究发现工会和半导体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入缺陷”;卡罗尔和德拉克诺克斯(Carroll & Delacroix, 1982)发现报纸存在的时间越长,越不容易死亡;卡罗尔(Carroll, 1985)指出,这种“新进入缺陷”规律在零售、批发和制造业里同样存在。而申等(Singh et al., 1986)则持相反观点,认为“新进入缺陷”并不是因为新的组织内部需要协调、变化引起的,而是因为制度对组织支持的外部合法性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对加拿大多伦多市1970-1980年间的社会服务自愿者组织的研究表明:组织内部变化除了首席执行官的更换会降低死亡率,这些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对降低组织死亡率的作用也很显著。其研究对外部合法性的具体测量包括社会服务自愿者组织是否出现在社区组织目录表上、是否具有慈善组织的合法身份以及组织的董事会规模,结果发现外部制度的支持会有利于弥补年轻组织的“新进入缺陷”。另外,有研究从企业的灵活程度出发,认为老企业容易有惰性,组织僵化,因此缺乏应对市场快速变化的灵活性,因此比年轻灵活的企业绩效差(Marshall, 1920)。

我们认为,在某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快速扩展时,这意味着新的民营企业有着良好的制度支撑,从而可以降低“新进入缺陷”的影响,同时新企业的灵活性使其能快速应对市场的急剧变化,因此我们提出了假设3。

假设3: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相对于老企业而言,对新的民营企业绩效越有利。

五、数据和方法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08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这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主持的。该调查的调查对象是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即民营企业企业家。调查样本涵盖我国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所有民营企业,而且涉及各个行业、各种发展阶段和规模,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是研究民营企业的较为通用的数据来源。在除去缺失值之后,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最终包括了1607个观测值。

(二)变量和模型

本文核心考察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所以因变量为民营企业的绩效,我们主要选取净资产回报率(ROE, return on equity)。由于该变量的分布是偏斜的,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取其对数。在数据分析中,我们也选取了衡量企业绩效的另一个指标——资产回报率(ROA, return on assets)做了稳健性检测,得到的结果几乎相同。

本文主要的自变量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是民营经济密度的增速。我们在前面分析中指出仅仅以组织个数来测量组织密度是片面的。朱克对卡罗尔和汉南(Carroll & Hannan, 1989)的测量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报纸在某个时候可能与种群内部的其他报纸竞争,但是在晚些时候可能与电台、杂志、电视竞争,但是电台、杂志、电视没有一个被列入组织密度的测量中”(Zucker, 1989:543)。所以,我们认为更合理的方式应该是考察该类组织在经济总量(至少包括竞争组织)中的占比。例如,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多行业与国有、集体和外资企业存在竞争。在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发展、已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我们将民

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民营经济密度或发展程度的测量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民营经济密度与合法性的关系。同时,不同于西方私营企业的是,合法性对于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Ahlstrom & Bruton, 2001)。另外,本文的组织密度测量以省区为边界。首先,这是受少数基于区域组织密度的竞争研究启发(Baum & Mezas, 1992; Lomi, 1995);其次,学界围绕着我国以省区为边界的地方保护主义展开了诸多研究,发现我国地方主义保护盛行、贸易壁垒森严(周黎安,2004;Young, 2000;白重恩等,2004)。“法国经济学家庞赛(Sandra Poncet)发现,1997年中国国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超过了同期欧盟成员间的关税,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他省产品的21倍”(胡向婷、张璐,2005:103)。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组织的竞争主要在省区内。

首先,我们借鉴了其他学者(樊纲等,2010;Li et al., 2008)的方法,选取了投资、销售和城镇就业三个维度,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2007,2008),先直接计算民营经济分别在三个维度中占总体经济的比例,再算术平均得出民营经济发展指数。

表1 各省区2006、2007年民营经济综合比重
(投资、工业销售及城镇就业)与增速(按增速排列) 单位:(%)

地区	2006	2007	增速	地区	2006	2007	增速
云南	15.80	19.07	20.73	河北	18.98	20.62	8.66
甘肃	12.02	14.05	16.87	陕西	9.61	10.41	8.33
海南	21.04	24.46	16.23	江西	24.13	26.12	8.22
安徽	20.18	23.36	15.76	江苏	35.08	37.86	7.93
重庆	21.79	25.12	15.27	山东	25.59	27.62	7.90
内蒙古	15.81	18.16	14.88	四川	17.33	18.52	6.87
浙江	23.08	26.26	13.79	广西	16.48	17.58	6.71
河南	17.51	19.85	13.37	山西	14.45	15.32	6.06
黑龙江	12.91	14.63	13.30	宁夏	16.51	17.32	4.90
福建	23.54	26.55	12.79	新疆	10.69	11.18	4.62
西藏	13.43	15.12	12.58	湖南	18.81	19.55	3.95
吉林	13.92	15.53	11.64	青海	20.63	21.04	1.94
辽宁	19.52	21.76	11.49	上海	28.42	27.75	-2.36
湖北	20.57	22.84	11.01	天津	19.33	18.70	-3.28
贵州	16.57	18.28	10.30	北京	13.78	13.15	-4.54
广东	22.19	24.44	10.14				

然后,我们用各省(区)2007年民营经济综合发展指数除以2006年的指数得到的百分数来衡量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增速,并以中位数来划分了快速和慢速增长地区。表1列出了民营经济2006年和2007年的综合发展程度以及增速。^①早期民营经济一向发达或者综合发展程度高的省份比如江苏、山东、广东的增速都明显落后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上海、天津、北京均出现负增长,处于倒数三位。而云南、甘肃、安徽、内蒙古、重庆等地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虽然不是很高,但增速却列于全国前茅,要高于上述地区及浙江、福建等省份。在数据分析中,使用民营经济增速的百分数或二分变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回归方程如(1)所示:

$$\text{民营企业绩效} = \beta_0 + \beta_1 \text{民营经济增速} + \beta_2 \text{民营经济发展程度} \times \text{民营经济增速} + X\delta + \varepsilon \quad (1)$$

除此之外,我们还考察了制度变迁下企业规模和年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选取2006年底该企业的员工人数(对数)作为测量企业规模的指标。企业年龄则是以企业注册年份至2007年底计算的,样本中的所有企业都是在2006年或以前注册的。

我们将企业规模和年龄分别与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交互,回归方程如(2)、(3)所示:

$$\text{民营企业绩效} = \beta_0 + \beta_1 \text{民营经济增速} + \beta_2 \text{企业规模} \times \text{民营经济发展增速} + X\delta + \varepsilon \quad (2)$$

$$\text{民营企业绩效} = \beta_0 + \beta_1 \text{民营经济增速} + \beta_2 \text{企业年龄} \times \text{民营经济发展增速} + X\delta + \varepsilon \quad (3)$$

上述模型中还包括了企业其他方面的一些特征,包括行业、总资产(对数)、财务杠杆、企业管理层规模,企业家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党员身份(李路路,1998),以及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即GDP总量(对数)等,以控制这些变量对企业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数据原本分为19个行业,由于部分行业的企业在有效样本中的个数太少,我们将行业做了合并归类,分为以下六大类:(1)农业、采矿业;(2)制造业、电

^① 根据一位匿名评审的意见,我们试图用更长时段的数据来测量民营经济的增速。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未提供2005年以前民营企业个数的数据,我们只能得到2005-2007年3年的平均发展速度。基于这一量度得到的结果也与本文报告的基本一致。

力;(3)交通运输邮政业;(4)信息、科技、金融、房地产;(5)销售行业;(6)其他行业。重新归类之后,最少的行业也包括了100个以上的企业观测值(见表2)。

六、结 果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数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净资产收益率	1607	.424	1.407	0	26.75
净资产收益率(对数)	1607	-2.151	1.55	-8.78	3.287
总资产(万元)	1607	2791.747	9091.236	2	205000
总资产(对数)	1607	6.319	1.879	.693	12.231
企业规模	1607	207.512	573.863	2	12000
企业规模(对数)	1607	4.142	1.515	.693	9.393
财务杠杆	1607	.240	.262	0	.993
企业年龄	1607	7.828	4.782	1	27
管理层规模	1607	.163	.105	.01	.5
行业					
农业、采矿业	1607	.090	.286	0	1
制造业、电力	1607	.496	.500	0	1
建筑、交通	1607	.094	.292	0	1
信息、金融、房地产	1607	.063	.244	0	1
销售	1607	.166	.372	0	1
男性	1607	.856	.351	0	1
年龄	1607	44.803	8.234	18	79
教育年限	1607	14.210	2.799	6	19
党员	1607	.366	.482	0	1

表2显示,共有1607个观测值完全具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民营企业ROE的均值为0.42,平均员工为207人,管理人员在全部员工中所占比例平均为16.3%,36.3%的企业属于服务业。企业在2007年的平均年龄为7.8年。85.6%的企业主为男性,平均年龄为45岁,受教育年限为14年,36.6%的企业主是党员。表3显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大多在0.3以下,同时,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中的VIF为

表 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资产收益率(对数)	总资产(对数)	企业规模(对数)	财务杠杆	企业年龄	管理层	男性	年龄	教育年限	党员
资产收益率(对数)	1.00									
总资产(对数)	-.16	1.00								
企业规模(对数)	.09	.71	1.00							
财务杠杆	.20	.29	.24	1.00						
企业年龄	-.03	.20	.18	.02	1.00					
管理层	.00	-.26	-.54	-.07	-.13	1.00				
男性	.03	.13	.15	.07	.08	-.08	1.00			
年龄	-.08	.14	.15	.04	.24	-.11	.09	1.00		
教育年限	.05	.23	.18	-.03	-.07	.06	.02	-.22	1.00	
党员	-.04	.21	.23	.09	-.02	-.09	.14	.23	.11	1.00

表 4
民营经济综合发展速度与民营企业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资产收益率(对数)								
总资产(对数)	-.471***	.028	-.468***	.028	-.472***	.028	-.468***	.028
企业规模(对数)	.490***	.040	.490***	.039	.530***	.044	.487***	.039
财务杠杆	1.561***	.141	1.573***	.141	1.561***	.141	1.552***	.141
企业年龄	.005	.008	.006	.008	.005	.008	.322***	.095
管理层规模	1.629***	.407	1.601***	.406	1.588***	.407	1.605***	.406

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行业								
农业、采矿业	.472 **	.166	.443 **	.166	.471 **	.166	.508 **	.166
制造业、电力	.017	.129	-.003	.129	.009	.129	.014	.129
建筑交通	.046	.163	.040	.163	.030	.163	.046	.163
信息、科技、房地产、金融	.400 *	.183	.391 *	.182	.408 *	.182	.387 *	.182
销售	-.038	.145	-.060	.144	-.040	.145	-.030	.144
男性	.094	.102	.087	.102	.099	.102	.088	.102
年龄	-.009 #	.005	-.009 *	.005	-.009 #	.005	-.009 *	.005
教育年限	.045 ***	.014	.045 ***	.014	.044 ***	.014	.042 **	.014
党员	-.176 *	.078	-.167 *	.077	-.175 *	.078	-.158 *	.078
省份 GDP(对数)	.014	.060	-.082	.067	.018	.060	.013	.060
2006 年民营经济发展程度	1.734 *	.687	2.329 ***	.709	1.700 *	.687	2.070 **	.693
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028	.078	10.044 ***	3.028	.405 *	.206	.232 *	.098
发展程度 × 快速发展			-8.863 ***	2.679				
企业规模 × 快速发展					-.092 *	.047		
企业年龄 × 快速发展							-.293 ***	.087
常数项	-2.749 ***	.604	-1.983 **	.645	-2.938 ***	.611	-2.860 ***	.603
观察数	1607		1607		1607		1607	
R ²	.209		.214		.210		.214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

1.78,这意味着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采用 OLS 回归模型是合适的。^①

表4中的模型1不含任何交互影响,显示了头一年(2006年)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对后一年(2007年)的民营企业效益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民营经济发展的增速的高或低对民营企业效益没有差别。这说明各省份民营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对民营企业的绩效具有正向作用;而脱离具体的发展水平,民营经济的增长速度自身对企业绩效不存在任何作用。模型2着重考察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与增长速度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快速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区)的民营企业绩效是负向的影响,而且非常显著。这说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份竞争激烈,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抑制民营企业的效益。相反,在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营经济在投资、销售、就业比例方面的提升会增强民营企业的认知合法性,以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即社会、政治合法性,这对民营企业的绩效影响是积极的。这个结果支持了本研究基于种群生态学理论推导出的关于合法性和竞争机制的假设(假设1)。

模型3和模型4分别检验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影响。模型3显示,民营企业的规模对其效益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越不利,这种不利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 < 0.05$)。这一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2,即大企业的优势在快速变迁的制度中会被弱化。模型4的结果显示了民营企业的年龄对其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样,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年龄越大对其绩效越不利,这种不利在统计上也是非常显著的。这一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3,即老企业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也会在快速变迁的制度中被弱化。这表明民营经济发展快的省区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比较大,新进入企业有良好的制度支持,这减轻了新企业的

① 虽然模型中包含企业和地区制度两层变量,我们并没有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原因有二:首先,多层线性模型的二层变量样本一般要求在50以上(Hox, 2002; Maas & Hox, 2005),而我们的二层变量样本为31个省市自治区。其次,多层线性模型常用在数据结构为“学生—班级”的教育学研究、或“个人—多次测试值”的心理学研究中。在这些典型运用中,同一个班的学生之间相互影响很大,来自同一个被试者的多次测试的结果更是高度相关。OLS回归的“iid假设”对于这一类数据难以成立。而在“企业—省份”的研究中,从某省几万、几十万个民营企业的总体中抽取的几十家企业之间并不具有很强的相互影响或相关性。事实上,我们所参考过的具有类似的“企业—省份/国家”的统计分析都采用的是OLS回归,比如李宏斌等(Li et al., 2008)、杜兴强(Du, 2014)、以及杨春方(2009)的研究。

进入缺陷,同时新企业也比老企业灵活,所以快速发展的制度对新企业有利。

另外,所有模型都显示企业总资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消极的,而管理层规模、财务杠杆的影响都是积极的,这些影响都很显著。从行业看,除了农业、采矿业以及信息、房地产、金融这两大行业分类的效益高于其他行业之外,其他四个行业类别之间没有差别。企业主个人背景中,教育年限具有很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些结果和之前的研究是大致一致的。而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在模型 1-4 中均有消极作用,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个发现有别于此前的研究,李宏斌等(Li et al., 2008)运用 2002 年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党员身份对企业效益有显著积极作用。这种差别或许与企业主的党员身份越来越普遍有关。李宏斌等(Li et al., 2008)的研究指出 26% 的企业主为党员,本研究中这一比例为 36.3%。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这不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此外,所有模型中都控制了各省 2006 年的 GDP,各省的经济总量对民营企业效益没有任何影响。

最后,我们还运用了资产回报率(ROA)作为因变量来检验了每个模型的稳健性,所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七、结论和讨论

受限于数据本身,本研究仍有一些缺陷,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本研究的数据仅仅包含了民营企业 2007 年绩效的横截面数据。数据本身缺乏前面几年的绩效和其他相关信息。更理想的数据是包括了所需信息的 3-5 年,甚至更长时段的面板数据,从而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更好的检测。

虽然受到了数据限制,但是我们认为本研究对现有文献有如下贡献:首先,本研究发现,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区,由于民营企业合法性已经很强,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受竞争机制的支配,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会加剧民营企业的竞争,降低民营企业的效益;相反,在民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合法性相对较低,但是在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方面,这些地区逐步赶上甚至超过了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这种合法性的提升促进了民营经济比重的快速增长,这种提升对民营企

业的绩效有积极的作用。这个发现说明,静态地比较制度发展程度的优劣可能是片面的,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生存、绩效的影响还需要考察制度变迁的速度。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揭示出我国政府可以进一步引导和促进民营资本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发展,从微观上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宏观上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其次,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和推进了种群生态学的研究。种群生态学主要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组织的生存、死亡和组建率,运用竞争性和合法性机制解释某个组织形式的长期变化趋势,而在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差异以及对于组织效益的影响方面研究不足。我们发现这种竞争性和合法性机制同样可以解释同一时段、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另外,我们将种群的概念从种群生态学一般研究的单个产业延伸至以所有制划分的组织类型。今后的研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研究某个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和变迁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另外,我们的方法也是对种群生态学理论的突破。种群生态学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方法,它运用组织的个数测量组织密度,分析组织的生存和死亡。种群生态学也正是因为这一固有的方法论而走向式微的。我们认为,仅仅从某个组织的数量来衡量其合法性的发展固然有道理,但不免片面,尤其是它忽视了不同形式组织间的竞争以及不同区域在发展程度和速度方面有别。在一个经济总量很小的地区,数目虽然不多,其合法性可能并不低;同样,在一个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地区,某类组织数目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合法性的提升。所以,我们认为选取某种组织类型的综合发展指数作为组织密度的测量指标更为合理。

最后,本研究发现,大企业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处于劣势,这支持了种群生态学中关于大企业的结构惰性理论。我们还发现年轻企业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具有优势,弥补了“新进入缺陷理论”在考虑制度支持方面的缺漏。

参考文献: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全月婷,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北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高柏,2008,《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郭毅、徐莹、陈欣,2007,《新制度主义: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社会》第1期。
- 胡向婷、张璐,2005,《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 李路路,1998,《向市场过渡中的私营企业》,《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刘玉照、田青,2009,《新制度是如何落实的?——作为制度变迁新机制的“通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许召元、李善同,2006,《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经济研究》第7期。
- 杨春方,200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经济学家》第1期。
- 杨典,2011,《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2008,《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
- 周雪光,2003,《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雪光、赵伟,2009,《英文文献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Ahlstrom, David & Garry D. Bruton 2001, “Learning from Successful Local Private Firms in China: Establishing Legitimac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5(4).
- Baum, J. & S. Mezas 1992, “Localized Competi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Manhattan Hotel Indust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
- Baum, Joel & Walter Powell 1995, “Cultivating an Institutional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Comment on Hannan, Carroll, Dundon, and Torr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4).
- Carroll, G. R. & J. Wade 1991, “Density Dependence in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Brewing Industry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
- Carroll, Glenn R. 1985, “Concent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Dynamics of Niche Width in Populations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6).
- Carroll, Glenn R. & Jacques Delacroix 1982,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in the Newspaper Industries of Argentina and Ireland: An Ecological Approac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7(2).
- Carroll, Glenn & Michael Hannan 1989, “Density Dependence in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s of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4).
- Carroll, Glenn R. & Yangchung Paul Huo 1986, “Organizational Task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Findings from the Local Newspaper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
- Chan, K. W. & M. Wang 2008, “Remapping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ies, 1990 – 2006: A New Assessment of de Facto and de Jure Population Data.”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9 (1).
- Covin, J. G. & D. P. Slevin 1989,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Small Firms in Hostile and Benign Environm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0.
- Du, Xingqiang 2014, “Is Corporate Philanthropy Used as Environmental Misconduct Dressing?”

-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y-Owned Firm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9(2).
- DiMaggio, P. J. & W.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 Fan, Cindy & Mingjie Sun 2008,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 – 2006.”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9(1).
- Fligstein, Neil & Luke Dauter 2007, “The Sociology of Marke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 Freeman, John, Glenn R. Carroll & Michael T. Hannan 1983,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Age Dependence in Organizational Death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5).
- Hannan, M. T. & G. R. Carroll 1992,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s: Density, Legitimation, and Compet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nan, Michael T. 2005, “Ecologies of Organizations: Diversity and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1).
- Hannan, Michael T. & John Freeman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5).
- 1984,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2).
- 1987,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American Labor Unions, 1836 – 198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 1988,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American Labor Unions, 1836 – 198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
- Haveman, Heather A. & Hayagreeva Rao 1997, “Structuring 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evolution in the Early Thrift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6).
- Hox, J. 2002, *Multilevel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Mahwah, NJ: Erlbaum.
- Leibenstein, H. 1976, *Beyond Economic 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 H. B., L. Meng, Q. Wang & L. Zhou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7.
- Li, S. T. & Z. Y. Xu 2008, “The Trend of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United Nations(e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8: Sustaining Growth and Sharing Prosper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 Lomi, A. 1995,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Location Dependence and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1).
- Maas, C. J. M. & J. J. Hox 2005, “Sufficient Sample Sizes for Multilevel Modeling.” *Methodology* (3).
- 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Meyer, J. W. & W. R. Scott 1983,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Sage.
- Miller, D., M. F. R. Kets de Vries & J. Toulouse 1982, “Top Executive Locus of Contro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trategy Making,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5.

- Nee, Victor 1992,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1).
- Peng, M. W. 2000, *Business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enrose, E. T. 1995,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Roland, Gerard 2004,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Fast-moving and Slow-moving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8(4).
- Shepherd, W. G. 1986,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In H. W. De Jong & W. G. Shepherd (eds.), *Mainstream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Singh, Jitendra V., David J. Tucker & Robert J. House 1986,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and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2).
- Stinchcombe, A. L.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J.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 Suchman, M. 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 Tucker, D. J., J. Singh & R. J. House 1984,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in a Population of Voluntary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9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TX: San Antonio.
- 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 Zheng, Y. N. & S. Tong (eds.) 2010,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NJ: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 Zimmerman, Monica A. & Gerald J. Zeitz 2002,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3).
- Zucker, L. G. 1989,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opulation Ecology: No Legitimacy, No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4).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宗仕)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郑路)
责任编辑:杨典